

桐鄉文史資料

徐昌齡題



第二十輯



前言

桐乡文化之盛，素有历史悠久、文采风流之誉。石门罗家角遗址为马家浜文化鼻祖，证明七千多年前早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是浙江地区最早的几处史前遗址之一。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在桐乡均有丰富遗存。今年发掘的新地里良渚文化晚期墓群遗址，因有重要发现成了轰动海内外的考古新热点。

唐宋以降，桐乡便成了繁华富庶之区，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愈趋深厚。赵汝愚、吕希周、张杨园、吕晚村、皆光鑑史册之辈。近现代，茅盾、丰子恺、陆费逵，则以艺文名垂千秋。

本市地当沪、苏、杭三大都会交汇点，虽属弹丸之地，然文物之丰堪称“大市”。因一，目前已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2处，列嘉兴之首。二，已查明的地下遗址遗迹有57处，亦在嘉兴各县市前列。三，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数量仅次于省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及温州、绍兴，位居全省第五。文物之盛是构筑桐乡文化名市大厦的重要支柱之一。为了展现本市馆藏文物之富，故在政协文史资料征编中增加了“馆藏文物资料”选目，计划逐步整理编印一批馆藏品图文资料，既丰富文化名市建设的多彩内容，也为文物爱好者提供研究和鉴赏资料。因此这可称得上世纪之初一件广受欢迎的桐乡文史盛事。

市委副书记 顾政宇
市政协主席

2001年10月



《桐乡文史资料》编委会

主 任：叶瑜荪

副 主 任：张荣泉 吴荣荣 傅林林 张梅坤

张森生 吴 珊 徐树民

委 员：朱近仁 屈楚宝 徐春雷 高仰之

邹蔚文 蔡 一 周敬文 朱莉韵

胡德波

本辑责编：张森生 胡德波

目 录

一、器物类

1、罗家角时期稻谷	2
2、马家浜文化黑陶釜（附支座）	4
3、马家浜文化鹿角“勾勒器”	6
4、马家浜文化骨哨	8
5、良渚文化石“耘田器”	10
6、良渚文化玉琮	12
7、良渚文化玉锥形器	14
8、良渚文化刻划纹黑陶豆	16
9、良渚文化红陶袋足鬶	18
10、良渚文化三足陶鬶	20
11、良渚文化玉神兽面头像	22
12、良渚文化玉三叉形器	24
13、战国原始青瓷提梁三足盃	26
14、西汉青铜灶	28
15、王莽（新）青铜镜	30
16、北宋越窑暖碗	32
17、南宋景德镇影青贯耳瓶	34
18、南宋黑釉兔毫盏	36





19、元龙泉窑莲花纹大盘	38
20、明成化款青花碗	40
21、明万历青花龙凤纹香筒	42
22、明龙泉窑粉青八卦纹炉	44
23、明万历孔雀绿釉盖罐	46
24、清康熙釉里红麒麟海水纹罐	48
25、清康熙青花地冰梅纹花觚	50
26、清康熙霁红胆式瓶	52
27、清乾隆粉彩历史人物图梅瓶	54
28、清乾隆珐琅彩开光花鸟纹瓶	56
29、清乾隆孔雀绿刻划暗龙纹长颈瓶	58
30、清乾隆粉彩雕瓷鼻烟壶	60

二、书画类

31、沈周 寿桃图	64
32、文徵明 窗前鸣珮长卷	66
33、陈道復 松石图	70
34、徐渭 墨梅芭蕉图轴	72
35、张宏 设色山水轴	74
36、陈老莲 赏梅图	76
37、宋旭 松壑楼居图	78

38、龚半千 水墨山水轴	80
39、蓝瑛 设色山水轴	82
40、王石谷 设色山水轴	84
41、新罗山人 花鸟轴	86
42、沈铨 祝寿图	88
43、汪巢林 墨梅图	90
44、郑板桥 墨竹轴	92
45、金冬心 花卉册	94
46、方薰 水墨山水图	96
47、赵之谦 花卉屏	98
48、任伯年 三公图	102
49、任伯年 人物图	104
50、虚谷 枇杷图	106
51、陈衡恪 墨梅扇面轴	108
52、弘一法师 魏书联	110
53、齐白石 残荷轴	112
54、于右任 魏书八尺联	114
55、柳亚子《读史三首·次韵和少炯》手迹	116
56、丰子恺特藏本《二十五史》	118
57、丰子恺 饮水思源图	120
58、丰子恺《源氏物语》译文手稿	122





59、丰子恺 《一剪梅》行书轴	124
60、吴湖帆 松石图轴	126
61、沈尹默录《毛主席批示》手迹	128
62、潘天寿 指画家禽轴	130
63、茅盾 《文课》墨迹	132
64、茅盾给桐乡县广播站的复信	134
65、茅盾给沈德汶的信	136
66、茅盾 《清谷行》长卷	138
67、茅盾给鲍祖宣的信	140
68、沈子丞 人物图	142
69、吴昌硕 印藏第九盒	144

器物類





罗家角时期稻谷

在7000多年以前的罗家角时期，在广阔的原野上，既有平原，又有湖泊和沼泽，地上有走兽，水中有游鱼，天空有飞鸟，树上有果实，浅水中有芡实和菱角，这一切都是人们攫取的对象，也是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在罗家角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兽骨、鱼鳞和芡实，说明当时狩猎、采集经济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这种经济方式必然受到时间、空间和自然环境的局限，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经济的比重必然扩大和提高。在罗家角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4件骨耜，用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与河姆渡出土的略有不同。罗家角出土的骨耜虽少，但已确定了以栽培水稻为大宗的农业生产经济，并在6个探方的第三、第四文化层中，均出土稻谷，其中T120（三）出土300粒，粒形完整的170粒，目测计数156粒，根据形态特征和长宽比例区分，属籼稻101粒，占64.74%。粳稻55粒，占35.27%。T119（三），出土150粒，较完整85粒，籼稻65粒，占76.47%，粳稻20粒，占23.55%，而粳稻又是籼稻的变异，籼、粳两个品种的同时存在，说明罗家角先民种植水稻还有更长的历史。更可贵的是在第四文化层中，出土了2件石臼，器形大而重，呈半球形，内壁下凹，通体打琢修整，壁厚6-11厘米，从形制上分析，属于加工稻谷的专用工具，说明当时已形成翻耕、种植、收获、加工等一系列配套工序，这在当时以水稻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已具有很高的先进因素，处在当时众多部落群体的前沿。目前学术界公认出土栽培稻谷最早的属于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其次，是桐乡罗家角；稍迟的有余姚河姆渡、吴县草鞋山、高邮龙虬庄、上海崧泽下层等^①。专家们认为，农业的起源是多元的，水稻的起源也是多元的。稻谷落地至来年自生的稻子称“秈”，在采集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的时代，这种自生自长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只要具备水稻生长的环境和气候，并有普通野生稻存在，均有可能成为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在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中，虽没有普通野生稻伴出，但《嘉兴府志》记载，三国黄龙三年（231），由拳县野稻自生，曾更名为“禾兴县”。至三国尚有野稻自生，在7000多年前的罗家角，野稻应该更为普遍，同时在当时的罗家



角一带河流纵横，水网密布，并富有野生稻的生长，自然是栽培稻起源的理想场所。把罗家角遗址作为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注释：（1）报载萧山跨湖桥遗址，也有稻谷出土，因未经C14测定，故未列入。

* 罗家角遗址位于石门镇东北2公里。

（张梅坤 撰稿）





马家浜文化黑陶釜（附支座）

陶器是古代先民生活的主要器具。新桥遗址属于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陶器有釜、罐、盆、钵、豆、匜、鼎、盘、支座、器盖等。釜是炊器，以腰沿弧腹釜为主，占50%；其次是筒形釜，占36.5%；带脊釜数量较少，占12.6%。弧腹釜自下而上增加，筒形釜和带脊釜，自下而上减少，三层以后，弧腹釜逐步取代筒形釜和带脊釜。这种消长、增减、取代的过程，说明马家浜文化的地方特色不断增加。

新桥遗址的陶器以素面为主，磨光和施陶衣，是陶器的主要装饰手法，使其美观实用。在少量陶器上施有纹饰，装饰手法主要有磨锉、刻划、锥刺、拍打、手捺、镂孔等。磨锉多见于釜的腰沿上，一般在烧好之后，可能用砾石侧锋磨锉腰沿的侧面，有粗齿和细齿之分。粗齿缺口较大，间隔较长，形似齿轮，故名“齿轮纹”；细齿磨锉较浅，间隔较短，形似锯齿，故名“锯齿纹”。中、上层釜的腰沿逐步由手捺代替磨锉，腰沿上扭曲的按捺纹，侧视如微卷的荷叶或鸡冠，至第三层按捺的方法为之一变，从上下按捺，变为上下挤压，出现深凹的指窝纹，有的还留有新月形的指甲纹。

新桥遗址的陶器臠和料有夹蚌、夹砂、夹炭（屑）陶。夹蚌陶占68%，夹砂陶占19%，夹炭（屑）陶占13%。这些臠和料应该就地取材，在遗址东侧有大量蛤蚬壳堆积，再从遗址往东不到5里的虎啸陈家埭，则有更多的发现。说明这一带，曾经有过沧海桑田的变迁。所以有大量的蛤蚬壳堆积，蛤蚬壳经火焙烧，作为臠和料可以耐水耐火，做成炊器防止破裂和漏水。这种方法，在南朝齐梁时期，一些炼丹方士和煮盐的手工业者，也曾采用粘土掺蛤蚬粉末做成陶釜，可达到“耐水大，不破裂”的目的，由于蛤蚬本地原料丰富，所以夹蚌陶器比较多；砂出在溪中海边，溪中之砂，雨水冲刷沉积，海边之砂潮汐积聚。而新桥离山海较远，砂源相对缺乏，所以掺砂陶器不多。夹炭（屑）陶所夹的系禾本科植物的茎叶，夹炭（屑）以后制坯容易成型，制成以后不易烧裂。但掺蚌、掺砂、掺炭（屑），都有一些弊端，胎质疏松，呈海绵状，表面粗糙，吸水性很强，所以往往施黑色或红色陶衣，以弥补这些缺陷。

* 新桥遗址在崇福镇西南郊大通新桥南堍东侧。

（张梅坤 撰稿）



马家浜文化黑陶釜（附支座）





马家浜文化鹿角“勾勒器”

1982年曾对浙江桐乡市新桥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较多的角制工具，最有代表性的是鹿角“勾勒器”，计16件，其中第五文化层10件，第四文化层4件，第三文化层2件。

新桥遗址地层清楚，文化内涵丰富，它的相对年代属于罗家角的中晚期，下层与罗家角第三文化层接近。该遗址出土的“勾勒器”与罗家角相同。这种勾勒器，钩叉上有大小不等的缓坡形凹槽；钩身内侧有磨损的光滑面，在部分器物的钩身上端，即在第二眉枝稍下的内侧有“U”字形凹槽和波浪形起伏面，系绑扎磨损所致；在钩身上部外侧有磨锉或砍凿的凹槽，这显然不是装饰，而是为了固定，使绳索绑扎结实牢固。这种勾勒器是马家浜文化类型中有代表性的器物。据目前所知，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21件，新桥遗址出土16件，谭家湾遗址出土1件，嘉善大往遗址T3的下层和崧泽遗址下层各出土1件。除此之外，限于见闻，尚无见到勾勒器的亲属，而在桐乡农村首先找到它的孑遗，当地农民常常使用一种树枝丫叉做成的“索钩”。这种索钩与勾勒器的天然原料不同，但外形特征和使用方式几乎完全一致。索钩的钩身上部系绳，农民在收获季节里用以捆扎带杆的庄稼，一簇簇一捆捆地放在索钩绳上，然后把一头的绳子放在另一头的索钩钩叉上，先用手一拉，同时靠腿部近膝上的力量，趁势往柴禾上一压，双手拉绳又狠狠一勒，借助索钩光滑的面和结实的质料，把收获物捆得严严实实，并熟练地用绳子往索钩上一绕，打一个活结，留出一个套扁担的“提头”，用竹制的扁担挑回家。这种收获作物的生产方式，随着调查的深入，使用索钩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不仅在桐乡，而且在邻近的海宁、嘉兴、嘉善、吴江等地都有同样的发现，嘉兴以北至吴江一带还喜欢用毛竹劈削而成的索钩。

索钩使用之广，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現象，应该有它的久远的历史源流，使人不得不想到马家浜文化遗址里发现的鹿角“勾勒器”即是当今嘉湖平原继续使用的“索钩”。

（张梅坤 撰稿）



马家浜文化鹿角「勾勒器」





马家浜文化骨哨

1980年在罗家角遗址下层出土一件骨哨，长10.8厘米，直径1.6厘米，骨壁厚0.1厘米，属于飞禽类的肢骨，两端分别刻划弦纹和斜线纹，组成两组图案，并在一端的骨壁上磨穿一孔。罗家角的骨哨在构造上比较原始，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要比罗家角多得多，有一孔，也有两孔，长6—10厘米，均素面无纹；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有三孔，制作较为粗糙，时代应该略早；更为新奇的是在1987年，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出土了一件长22.2厘米，用猛禽肢骨制成的七孔骨笛。如果说罗家角、河姆渡、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骨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乐器，而是先民用于模仿禽兽鸣叫，达到诱捕围歼的狩猎辅助工具的话，那舞阳出土的七孔骨笛，已具备了现代笛子的形制，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管状乐器。

笛子，属于中国古代乐的“八音”之一。“八音”是古代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不同材质的乐器。古代用“竹”字头的字命名乐器的大约有十几类。包括吹奏、拨弦和击弦三种，而吹奏乐器占绝大多数，主要有竽、笛、笙、管、箫。这些乐器的名字，都出于形声字。以“竹”为形符，作为约定俗成的造字者，所见者皆为竹制。但罗家角、河姆渡、跨湖桥或者那贾湖遗址出土的均为骨制。综观古今管状吹奏乐器，应该是从骨制发展到竹制，然后发展到金属制品。如现在的西洋乐器，凡管体用木制的，如双簧管、大管，称为“木管乐器”；凡管体用金属制的，如长号、小号，则称为“铜管乐器”。当今管状乐器，已成为乐器世界的大宗。它的“根”可追溯到7000—8000年前的桐乡罗家角、余姚河姆渡、跨湖桥和河南舞阳贾湖四个古代人类居住的地方。虽源于四处，但根是深深地扎在一起的。

（张梅坤 撰稿）



马家浜文化骨哨





良渚文化石“耘田器”

八十年代初期，在屠甸星星村小六房遗址，出土一件“耘田器”，器宽14厘米，背至刃高6.6厘米，背内弧，两角起翘，中间有桥形外凸，中钻一孔，孔径0.7厘米，两面均有阴刻纹饰，一面圆圈两个，一大一小，右上为双线大圆，内有纹饰，笔者过去曾对此称为四出连弧，现在看来拟像四鸟相连的鸟纹；左上为单线小圆，并有似辐射状的纹线；下面有几条平行与交错的线。从整体上看拟为日、月、大地的纹饰。

这件石“耘田器”，是比较典型的良渚文化早期的器物。“耘田器”上日、月、大地的纹饰，拟即天体崇拜的形象描绘。天体崇拜似应始于游牧时期，农耕时期得到了普遍发展。小六房下层正是从崧泽中层向良渚早期过渡时期，农业逐步成为当时主要的生产经济，农业丰歉关系到先民的生存。由于天体中的太阳、月亮、星辰对作物生长与节令、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所以先民特别重视对日、月、星辰、大地的祭祀，祈求农业丰收。此器的纹饰应该看作先民对天体祭祀的记录。又从这件“耘田器”器口锋利看，应该与收割禾本科作物，特别与收割稻穗有关的收割工具。工具上的纹饰应该是祭祀天体的记录，所以“耘田器”从实用器进入了祭祀的礼器行列，变成了一件神圣的东西。更深一层分析，这种图形记录，也正是我国象形和指事文字起源的雏形。

四出连弧纹，最早见于崧泽陶觚刻划符号^①，除四出连弧外中间又加了两竖。现假设为四鸟连体纹，是笔者根据瑶山、反山和新地里出土的椭圆形豆盘及其他器物上的阴刻鸟纹联想而来的。特别是在椭圆形豆盘内，中间为太阳纹，两侧是鸟纹，这种鸟纹很简约，呈弧边三角形，似速写中的海鸥，似山水画点缀的大雁，围着太阳转。“耘田器”中四出连弧纹正像点缀中的鸟纹。在古代，鸟是代表人类通往太阳的使者，鸟的神圣地位，往往成为东南沿海众多氏族或部落的图腾，太阳中有金乌的传说屡见于史籍记载，汉代画像石和马王堆帛画，关于太阳中有金乌的传说得到了形象的记录。代表南方的朱雀，被列为四个方向神之一，这应该与良渚文化时期的太阳和鸟纹，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

注释：(1)《崧泽》第60页，图四六：2

(张梅坤 撰稿)